



第4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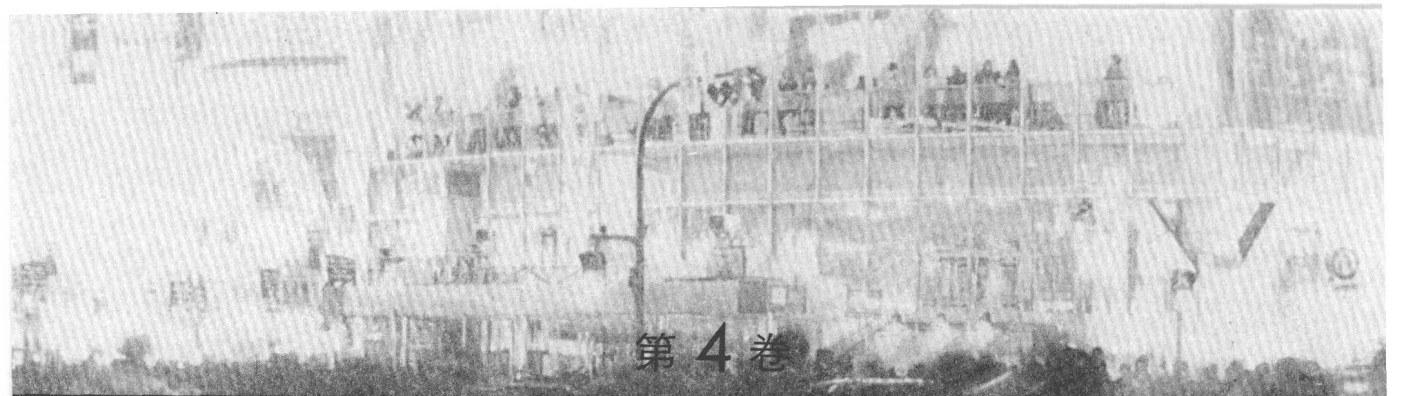
COMMENTS ON URBAN CULTURE

城市文化评论

[主编] 田根胜 黄忠顺
[特约主编] 李 杨
[副主编] 阎 江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第4卷

COMMENTS ON URBAN CULTURE

城市文化评论

[主编] 田根胜 黄忠顺
[特约主编] 李 杨
[副主编] 阎 江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文化评论. 第4卷 / 田根胜, 黄忠顺主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60-5763-0

I. 城… II. ①田…②黄… III. 城市—文化—中国—文集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8188 号

责任编辑: 李道学 欧阳蓓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25

字 数 31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城市如何成为问题(代序)

李 杨

本期《城市文化评论》收入的文章大部分是2008年8月在深圳召开的“2008中国城市文化论坛”上发表的论文。这次会议由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东莞理工学院城市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由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具体主办。会议代表除来自上述机构外,还有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大学、浸会大学、岭南大学等单位的人文学者,以及深圳本地的文化学者、东莞理工学院城市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这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跨越专业的限制聚集在一起讨论城市问题,再现了近年勃兴的城市研究的胜景。就我个人从事的文学研究而言,“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很难绕开的话题。所以在这个会议上,我曾经问了一个颇具自我指涉性的问题:我们为何关注城市,或者说,城市如何变成了我们的问题。所谓“自我指涉”,指的是我提出这个问题不仅仅为了向与会的代表讨教,同时,这也是我反复问过自己的问题。虽然大家都以城市为谈论对象,但由于大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不尽相同,因此,城市其实是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被理解和讨论。理清这些不同层面的问题,对进入问题的方法本身形成自觉意识,相信对研究的深化不无裨益。

从最浅显、最直观的意义上来理解,我们之所以关注城市,讨论城市,应该首先是因为我们都是城市的居民,都有对城市生活的理解和感受,但如果我们将城市这一话题历史化,我们就会发现问题远远不像我们从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事实上,我们对城市的理解,不仅常常受制于思想、观念与知识——譬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发展主义者,你会赞美城市,将城市理解为现代化的标志;如果你是一个缅怀传统的浪漫主义者,你会不由自主地将城市理解为罪恶的渊薮。已成为现代文学母题的“还乡”就是与城市相对的乡村之“乡”,与异域文化相对之本土文化之“乡”,是与道德沦丧、人性衰退、精神荒芜相对的道德人伦醇美、人性自然的精神原乡。……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城市的理解,还受制于我们所处的时代。以文学作品为例,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经典主要是农村叙事,关于城市的叙事非常少,《上海的早晨》可能是很少的一个例外,表达的也主要是对城市的批判和改造。《青春之歌》写中国知识分子成长的历史,写完了之后,大家还觉得不全面,因为林道静的故事都发生在城市。后来出修订本的时候,杨沫就对小说进行了修改,主要是增加了林道静在河北农村锻炼的经历。因为按照这一时期中国主流的历史叙事,只有在了解中国的农村之后,知识分子才能真正了解和认识中国。而城市,只是中国的假象,在这一视阈中,城市是不真实的、腐朽的,城市的霓虹灯下需要有我们的哨兵。到了1980年代,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关系被颠倒过来。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被表述为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在“知青文学”中,“回城”被表述为从野蛮回归文明,从历史走向未来。当城市化被理解和表述为“与世界接轨”、“中国走向世界”的标志时,城市故事逐渐成为唯一的中国

故事……

显然,在城市的知识史中,城市从来就不是被单纯地理解为一个封闭的空间构造和人口聚集地,而是被视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载体,甚至可以说,它就是“现代性”本身。恰如沃斯所指出的,“大城市的发展标志着文明发展史上鲜明的现代时期的开始。在城市独特的生活环境中,人类首次与有机的自然分离开来”,更重要的是,“城市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并不能完全或精确地衡量当代世界‘城市化’的程度。城市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比城市人口的比例显示的还要大。城市日益成为现代人的栖息地和加工厂,是发动并控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它将世界上最遥远的社群纳入其运行轨道,将不同地区、民族和活动编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世界”。^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城市对我们的意义就远远不是城市本身,它浓缩了我们对“现代”的复杂经验。因此,在我们对城市的讨论中,城市是作为现代的一个标志,或一个喻体加以理解的,或者说,城市成为了我们讨论现代性的一个中介。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一个令人瞩目的转向,是完全臣服于“现代”的新时期共识发生了分裂,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简单地停留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全球化的理想化想象之中,开始关注全球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复杂后果,并且在人文学界产生了越来越普遍的影响。关于这种转向发生的理由,学界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基于对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形成的一种批判性的新立场和思路,而有人则将其理解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与居于西方学术中心的批评知识分子“接轨”的产物,不过是话语场域和学术活动“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实质上是一次以反全球化为名的全球化运动。对这些观点的辩驳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关注的问题,是这种知识乃至价值观念的转向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城市研

究。城市这个现代性的核心装置,理所当然会在这一新的知识场域中受到重新审视和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对西方的复制,是通过中国的城市对纽约、伦敦、巴黎这样的西方城市的复制加以体现的,而中国国内的现代化进程,则体现为中国的中小城市对这些复制的中国城市的再复制。因而在批判知识分子那里,城市作为一个人造机器——城市不是大自然的天赐,而是标准的人造物,城市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全部恶果。一方面,如某些研究者所说,城市的文化主义,不可能不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另一方面,反过来,城市的发展主义,不可能不是文化观念的产物。因此,对包括城市文化在内的城市现代性的分析与解构,很自然地成为当下城市文化研究的基本命题。这种趋向也从我们这次会议的文章中集中体现出来。

当然,人文批判知识分子对城市的批判与解构,如何与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建立起关联,这也是人文知识分子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就是如何在“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关联。这也是包括城市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面临的共同问题。批判理论不能始终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面,文化理论对城市乃至城市化进程的反思和批判无疑是有效的,但如果这种理论与批判都没有获得批判理论预想的“改变世界”的实践目的,那么这种研究就很难不流于一种肤浅的局限于校园的“学术政治”。而对于深圳这样的年轻城市和在深圳这样的城市从事文化管理、研究和文化实践的同仁来说,他们更关注的问题,显然是理论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的运用。这次深圳会议将两支队伍聚合在一起,应该说是一个难得的创举。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深圳人文

^① Louis Wirth,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4.

学科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应用型学科和政策性研究,从事人文社科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人员数量不多,在文化研究领域与其他城市的学术机构合作,空间和潜力都是巨大的。而且这种合作并不是单向度的施予,它既是深圳的需要,也是这些人文学者自身的需要。包括深圳在内的中国城市研究为人文学者走出大学院墙,走出象牙塔,重建学术与社会的关联提供了契机,提供了一个以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社会的渠道。

在深圳这个中国最年轻的大城市从事文化研究与文化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深圳在发展主义时代提出的影响全国的口号,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深圳能为我们提供新的启示。与那些有着久远历史传统的城市相比,深圳没有什么老本可吃,没有什么传统的资源可以借用,但这反而可能成为深圳的优势。在深圳,有许多问题几乎是扑面而来,根本无法回避。所以我觉得深圳从事文化研究和文化实践的同行是非常幸运的。农民工的问题,户籍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认同的问题,价值问题,归宿感,文化自主性的问题,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乃至文化公共政策的实施,等等,这些问题,在其他城市也会出现,但在深圳会表现得更为尖锐,必须加以回应。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政治问题、制度问题,但实际上,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文化问题、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常常关注政治的变革,将所有问题都理解为政治问题,但实际上,政治实践是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产物。政治理念是由文化理念转化而来。而有效的文化实践必然依赖文化理论的突破。在这个意义上,深圳不仅仅是深圳同行的问题和机会,也是我们这些从事人文学科和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的共同挑战、机遇和使命。

事实上,当批判知识分子一方面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另一方面则开始反省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以探询

一种“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的可能性的时候,“城市”很自然会负载新的理想和寄托。这次会议的一些文章就可以视为这一实践的成果,这些研究体现出批判性城市研究的近期发展,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新兴领域,它通过将批判文化研究注入更加传统的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化过程的社会科学分析发展而来。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取得的成绩也非常有限,但在城市研究中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体现的是我们对城市认识的深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发展,中国城市的发展基本上由极端的发展主义所主宰,几乎所有地区的政治经济的本质都是“增长”,不管地方官员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对增长的追求是他们取得政治共识的最基本的动力,城市在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台增长机器。我们把城市当成了企业,对城市进行企业化管理,城市是我们挣钱的地方。城市文化只能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点缀和附庸,说得难听一点,是赤裸裸的经济巨人的一块遮羞布。所幸的是,随着近年这种极端的发展主义带来的恶果日趋呈现,我们开始重新思考发展的意义,重新思考人与经济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倡导以人为本,以和谐社会为方向 and 目标的新的改革实践中,文化将大有可为。可以说,经过了30年的发展之后,我们对改革的认识加深了,对城市的认识也加深了。与国家一样,城市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或者说,城市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城市既是一个容器,又是一个磁体,既是我们工作的场所,又是我们的家园,还是文本和符号。因此,我们不能只考虑城市的经济功能,而应该考虑城市如何才能让人们变得更加幸福。在重新认识到城市的意义之后,理论界有必要重新界定城市的形态、功能、结构(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以及城市社会的需要。与传统的城市研究集中讨论生产力的变化,以及生产力带来的生产关系的

变化的不同——比如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城市是一个经济学的单位,政治学的单位,因此比较多地从物质层面上讨论,从文化研究的层面切入城市研究,将打开新的城市研究的空间——当然也是打开新的城市空间。在这方面,有许多研究角度可以为我们借鉴。比如本雅明的方法,将美学与政治,与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实际上是把传统的经济决定意识的问题颠倒过来,将城市理解为一个具有可视形象的故事。在他那里,城市的商品化过程、商品崇拜、特殊的资本主义时空形式的出现,都是通过叙事完成其“道成肉身”的过程的。在这里,是城市的叙事,是城市的“象征与表意系统”,而不是城市本身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通过研究符号和文本意义上的城市,关注城市的寓言与象征,聚焦“都市感觉结构”,通过对城市进行精神分析学的解读,带领我们认识城市的感官系统。这些思想的轨迹在这次会议的不少论文中都有所体现。虽然在将文化研究的方法注入传统的对城市的社会科学研究,将批判性城市研究与建构性城市研究结合起来,将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结合起来等方面,我们还有太长的路要走,但只要城市化仍然是现代化的集中表达方式,这种解释

城市和改造城市的努力就不会中断。

在某种意义上,这次深圳会议揭示的症候是意味深长的。一方面,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反现代的乡愁会永远内在于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对城市这一现代性的装置抱有怀疑和警惕,另一方面,不管我们多么不喜欢城市,我们仍不得不承认,城市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城市的发展和世界的城市化已经成为我们置身的这个被称为“现代”的时期中最令人难忘的事实之一。按照社会学家的估计,到2020年,全球6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里。诸如美国和日本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乡村社会向占支配地位的城市社会的转变,而这一切正在中国以更快的速度重演,并深刻地改变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人文知识分子在承认这一现实的同时,也在确立自身的位置:如果我们承认城市并不是大自然的恩赐,城市是一个人造机器,那么,把城市建设成什么样子,取决于我们对城市功能的理解与想象,更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幸福,理解生活的本质,理解人性——当然,也取决于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知识分子对“城市”的干预与介入。

(作者:李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 杨 城市如何成为问题(代序)	1
------------------------	---

理论视野

李凤亮 市民社会建构中的当代文艺生产	2
[日]仓石忠彦撰 於芳译 日本民俗学中的都市化概念	6
罗 岗 城市文脉与理性规划	13
——从“灾后重建”看中国城市多元发展的困境	
孙民乐 符号的秩序:全球体系中的城市与文化	18
——提纲与札记	
张炼红 理论与实践:重建以“城市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	32

都市文化记忆

谢 冕 城市书写的变迁	36
——在深圳“中国城市文化论坛”上的发言	
袁 园 贾樟柯电影中的城市书写与中国想象	39
王洪琛 金庸小说与城市	48
于晓峰 深圳文化精神解读:深圳早期小说研究	55
耿 波 相声艺术传统与北京城市文明格局的变迁	65

城市与城市身份

洪子诚 城市中的历史景观	76
张咏思 当孤岛们相遇——沪、港、台的“三城记”	78
张海燕 城市记忆与文化认同	96

城市发展论坛

张 引 王志章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再生产与城市化路径: ——一种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	106
桂晓筠 中国城市发展夜间经济的社会学思考	111
——以重庆为例	

倪浓水	对舟山海洋城市文化名城建设的若干思考	119
袁奇峰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使用及其利益格局研究	127
	——以珠江三角洲的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陈柳钦	我国城市经济学科发展动态分析	136
软实力与城市竞争		
王启凤 王志章	关于城市“软实力”构建的一些思考	154
倪 伟	文化经济与城市文化	164
	——兼论深圳城市文化建设的定位	
饶芃子	“双三角论坛:当代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 国际学术研讨会——大学与当代城市文化建设	167
牛桂敏 陈柳钦	生态觉醒与生态城市建设	170
媒体中的城市		
喻季欣	珠三角城市化进程中平面媒体嬗变的文化追求与影响 ...	180
汤哲声	网络文学:当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视野中的 传媒与文学(文艺)联姻	186
全球化的城市想象		
许维贤	情爱北京的兄弟们	192
	——从《品花宝鉴》到《北京故事》的亚文化想象	
陈建华	“狼爱上羊”和全球化都市寓言	205
马杰伟	静观中国时尚大潮	210
打工文学与文化政治		
张慧瑜	农民工:暧昧的命名与尴尬的主体位置	214
柳冬妩	“打工诗歌”:在城乡之间游移	224
征 稿		230

理论视野

LILUNSHIYE

市民社会建构中的当代文艺生产

李凤亮

在中西方文艺理论史上,有两个问题一直为理论家们所关注:一是“何为艺术(文学)?”即“文学性”、“艺术性”或文艺的本质问题;另一个是“艺术(文学)何为?”也就是文艺的功能问题。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当代的伊格尔顿、德里达、福柯等,中国从孔子、刘勰、曹丕、白居易到王国维、梁启超、宗白华等,都曾致力于提出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答案当然是不统一的,归结起来,在艺术本质与功能问题上,形成了两种相对对立的观念:一种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同时也对社会生活起到影响作用。作用之大小,则视题材的重要程度、文艺作品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时代风气与政治环境等而形成变化。另一种观念与此相反,从文艺自身界定文艺,认为文学性、艺术性只能或主要与文学艺术的形式要素(如语言、表象方式、艺术手段等)有关,排斥社会生活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及文艺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力。这两种观念时而轩轻分明,时而交融合流,形成了文艺理论史上的众多派别。

虽然在文艺的本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不小分歧,但在其客观现实性上,文艺从未真正脱离社会生活而独立存在过。有鉴于此,自亚里士多德的“陶冶”说、孔子“兴观群怨”说开始,许多重要的理论家,都曾对文艺的社会作用进行过充分的肯定。文艺的作用在特定情境中甚至被故意放大,在这方面,清末民初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理论堪称代表。

他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在梁看来,“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梁对小说熏、浸、刺、提四种功能的放大,不仅促进了晚清小说理论的探讨、创作的繁荣以及古典小说的研究评价,还开启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功利主义的先声。当然,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功利主义主张,并不只是在梁启超这样的学者影响下形成的,它更多地受制于“救亡图存”的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事实上,不仅小说,现代戏剧、新诗、杂文、民族音乐、美术等各个文艺门类,都参与到了20世纪中国追求



梁启超画像

(来源: <http://szll.sdut.edu.cn>)

民族国家独立和现代性的征途中。在这方面,戏剧以其对底层民众特有的亲和力,而发挥了更为现实而直接的精神鼓舞作用。

二

新时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消费的语境、方式及趋向发生了重大调整。与此相适应,文艺的功能也由既往较为单一的政治教化转向多元。如果说80年代中期以前,文艺还以其精英的面貌在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据着某种高位的话,90年代以来商业化、市场化及由此带来的文艺通俗化、消费化,则彻底改变了文艺创作与消费的整体格局。文艺的“精英”意识遭遇瓦解,“经典”成为人们不可企及的目标,或索性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名词,成为当代文化消费的对象。8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发生逆转,由“导大众”变成了“大众导”。报纸、电视、网络、时尚杂志等新兴媒体的勃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展演平台。一部分知识分子及时而巧妙地实现了“身份置换”,从原来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变成了经典大众化的传播者、实践者。媒体上各类文化栏目、节目的出现,与其说在建构一种新的精英文化,毋宁讲更多地是在普及大众不熟知的学问或经典。“余秋雨现象”和“易中天现象”是90年代和新世纪的两个典型个案。在这里,传统经典的深奥被一种当下语汇转化为民众容易接受的平易;在沉重的经典、精英、学术、文化与大众粗浅而又向往“短暂深刻”的文化消费需求之间,一部分敏感的学者巧妙地找到了自己作为“中介者”、“阐释者”、“传递者”甚至“贩卖者”的位置感。在这里,媒体尤其是视觉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詹明信说,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文化特征上的重要区别,即是一种“文化的扩张”;一切都成了商品,包括经典、艺术和理论。尚未全面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当代中国,过早地品尝了

后现代“文化的扩张”的意味。

当代文艺生产正是在上述消费语境中呈现出悖论性的面貌与意义。一方面,文艺精英意识、经典意识的消解,直接带来了精神深度模式的缺位。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缺少了传统作品的厚重大气,作品中应有的“思考者”角色也不见了,有关身体、暴力、物质、时尚的廉价故事,满足了人们的“力必多”宣泄欲、隐私窥视欲、想象性消费欲;甚至一些作品以迎合读者的上述低俗欲望为旨归,文艺的精神原创性、超越性被大大降低。上述现象的出现,固然也有针对新中国以来30年文学压抑人们日常情感的反弹意味,但是,政治功利主义却正让位于一种市场功利主义。一些学者由此疾呼人文精神的品位、审美性的复归。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消费语境的变化,也促使文艺日益回归它的本意。包括通俗小说、影视剧、流行音乐、装饰画、休闲副刊等在内的文艺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对于纾解城市人的生存压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代文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缓冲负面社会情绪的功能。当代文艺作品对时下生活的过于贴近,虽然阻碍了精神的深层超越,却为我们考察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留下了十分独特的“精神文本”,其文化记载意义尤其值得关注。这些是我们评价当代文艺时不能忽视的重要面向。

三

文艺消费语境的根本变化,传达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信息,即市民社会的产生与成长。何以言之?因为当文艺从政治性需要转向日常生活需要时,文艺消费需求的变化实际上折射出社会生活形态的变化。生活的重心从“唯意识形态”转移到了与人们自身相关的日常生活形态,个人,便呈现出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在以往以政治生活为中心的社会结构里,个人是不存在的(或至少是不重

要的);换言之,在“公”的权力话语面前,“私”是落后甚至罪恶的象征。个人的情感甚至一些基本生活享受,是没有存在的合理性的。“文革”抄家、“破四旧”的基本逻辑,正在于此。社会生活的整一化,意味着社会运作成本的降低,却并不意味着一种合理与和谐。在特定环境下,集体精神往往等于对民众个性及选择权利的剥夺。而个性与选择权,正是市民社会得以成立的价值前提。文艺消费的多元化、日常化及其对宏大叙事的背离,正是个性与选择权在艺术领域的一种表现。我们不应仅仅从审美价值的高低评价一部作品,有时候还要更多地引入文化视角,考察文艺消费趋向变化的社会学意义。文化消费的选择权、文化享受的合法性,由此也成为这个社会合理程度的重要尺杆。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逐文艺评判的审美标准。艺术从来都应该维持其应有的基本的尊严,这种尊严包括了人性探索的向度及对美的基本确认。放逐人性与审美,追求所谓“自然”、“本能”的属性,必然会大大损伤艺术的尊严。而这正是当前文艺界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回到上文所讨论的文艺功能问题,我们似乎更能看清文学艺术在当前市民社会建构中的特殊作用。一个合理的市民社会,固然不能在制度层面上缺失法治(这正是个性与自由的保障),在伦理层面上缺失人格,但其更不应缺失的,还有心灵上的滋养,这种滋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代的艺术生产。我们已经日益注意到艺术氛围、艺术素养对于现代人格养成的重要作用。很难设想,在一个过度商业化而又缺少诗意的城市里,人们能够自由地呼吸、快乐地生活,养成健全的精神人格。公共文化空间尤其是艺术空间的多少,不仅标志着一个城市的品格,还左右着这个城市多少年后可能的命运。公共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其回报是缓慢的、持久的、无形的。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对民众

的影响也是通过潜移默化来进行的。在艺术家、艺术活动、艺术作品与公共文化空间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却又不露痕迹的联系。有着杰出成就的艺术家,其公众号召力是巨大的;重大而有特色的艺术活动,对公众的吸引力也是不言而喻的;而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上游产品的文艺精品,更是直接影响着公众的文化消费品位及精神价值定位。文艺精品是可重复消费的,这就形成了文艺精品对受众持久、广泛的影响力。政府在这方面的角色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过去直接“主导”民众的艺术消费需求,到今天通过扶持、赞助艺术家、艺术活动和艺术机构,来构造生机勃勃的公共文化空间,并借此“引导”民众的艺术消费趣味,政府正日益走出以往的误区,强化自身的公共文化服务意识。

四

这当然不等于说当代艺术家的文艺生产和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已完全满足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建构的需要。事实上,与后者强大的需求相比,当代文艺生产及文化服务还相当缺位,在一些具体操作措施上还有相当大的延伸与拓展的空间。



露天舞会

(来源: <http://hi.baidu.com>)

其一,文化服务的硬件设施建设还要加

大力度。毋庸置疑,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设施有了极大改善,一批美术馆、音乐厅、博物馆、图书馆、文化广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相继建立。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中上述文化场馆的人均拥有数量还很小。这种情形,似乎不能仅仅以资金困难作为简单的托辞,更有一种文化意识的缺失在其中。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即使在一些文化事业经费充裕的城市,文化管理者们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也有待提高。比如,有些地方每年投入大量经费于文化领域,致力于一些“面子工程”、重大项目,一批大的场馆建立起来,但因其过分集中而导致使用率较低,而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却是化整为零,将上述场馆分散建设到社区,提高公众的文化意识与场馆的实用功能。再如,每年花费大量经费出去,却没有意识去竞购一些国际艺术大师的精品力作,其间包含的文化短视意识十分显见。

其二,当代文艺生产与公共文化服务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维护应当加强。一个合理的市民社会,其核心价值观是向上的、人性化的。这种核心价值既拥有社会历史的长期积淀,又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众所周知的好莱坞,其出产的影片,大多以坚持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为基调。爱、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是众多好莱坞电影的精神关键词。正是坚持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弘扬,好莱坞电影才不仅获得美国人的认可,还受到世界各地的欢迎。相比之下,我们的文艺作品却显示出两个相当明显的精神缺失:一些所谓的“主旋律”作品,往往基于对“主旋律”的简单理解,口号现象严重,严重脱离群众生活实际,自然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另外一些文艺作品,则片面迎合部分群众的低级趣味,不仅玷污艺术的神圣,而且也漠视了其他观众读者的审美能力,其影响自然是负面的。当

代文艺生产正需克服上述两种弊病,以一种尊重受众的虔诚意识,致力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与维护。

其三,当代文艺生产的审美批判功能应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强调艺术生产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维护,并非讲艺术一定要说好话、唱赞歌。恰恰相反,艺术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唤起民众对于社会生活合理性的反思。阿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想阿多诺的本意,是想指明艺术在面对巨大苦难时的无助与无力。然而,正是阿多诺本人,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话:“实际上现在只有在艺术中,苦难尚能找到它的声音与慰藉。”艺术一方面借助于肯定美的事物给人以生的希望,另一方面还通过否定丑的事物来匡扶人间的正义。这正是人们欣赏艺术、喜爱艺术、寄情于艺术的两个基本理由。它们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双面,共同维护着艺术应有的深刻的尊严。艺术家的批判,不同于政治家对意识形态的直接批判。他们通过自己敏锐的视角,将对当代生活的理解转化为有批判力的审美作品,供人们去感受、理解、领悟、升华。因此,艺术作品中对于现实生活的批判,也许不及政论、时评来得直接、尖锐,却往往更为深刻、内敛、持久。它们所引发的思考,不只是针对现实社会的,更是针对人生和人性的底端和深层的。一个健全合理的现代社会,应当容允艺术家对于社会人生的批判性思考。有了这种思考,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才有切实的保证和现实的体现;艺术家作为思考者,才可能担当起应有的艺术道义,才能为市民社会的合理建构提供必要的精神维护和价值支撑。

(作者:李凤亮,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副校长)

日本民俗学中的都市化概念

〔日〕仓石忠彦撰 於芳译

引言

在日本民俗学中,正式将都市作为其调查、研究对象是在1970年代之后,而被称为都市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引起人们重大关注也是在1980年代^①。这恰好是日本社会人口向都市集中和都市周边地带住宅区化发展的时期,同时也与随之产生的专业农户急剧减少不无关系。即所谓的都市化浪潮席卷农村,大规模地改变之前的农村生活模式的时期。

人们一直认为农村生活由更为古老的生活文化所支撑,而且代表着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文化,因而迄今为止作为民俗学主要调查、研究对象发挥其作用的农村生活的变化,必然导致民俗学思考方式的改变。也就是说在把农村生活文化的变化当作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时,作为引致其变化的重要原因,就不能无视都市的存在。而这种认识迫使我们不得不对民俗学研究的整体构成进行再次探讨。

一、“都市”与“村落”

在把作为本民族文化的日本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民俗学里,“都市”概念未必明确^②。村、町、城市等词语,作为表示具体的空间和生活形态的语汇,自古以来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可是,能够称为“都市”的地方,除了“都”以外,长久以来在日本是不存在的。在日本近世,有添加了江户、大阪而称为“三都”的地方,但是在日本文化里它也是一个特别地域。因此在以极为普通的民众生活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俗学中,它也没有被选取为研究对象。即使有选取“三都”为研究对象的例子,那也不是把它当作“都市”概念的本源,而是将它看作为京都、大阪、江户这一个别的具体地域来对待^③。这一地带的的影响扩展至周边地域,被叫做“京

① 千葉徳爾「都市内部の葬送習俗」『人類科学』第23集 1971、倉石忠彦『都市と民俗学』『信濃』28卷10号 1976、高桑守史「都市民俗学—その研究動向と課題」『日本民俗学』124号 1979、宮田登『都市民俗論の課題』未来社 1982、岩本通弥他編『都市民俗学へのいざない』Ⅰ・Ⅱ 雄山閣出版 1989、倉石忠彦『都市民俗論序説』雄山閣出版 1990、小林忠雄『都市民俗学—都市のFORUKU SOCIETY』名著出版 1990。

② 倉石忠彦「マチ・町・都市」『国学院雑誌』94-11 1993、内田忠賢「「都市」再考の試み—ムラの中のマチ—」『現代都市伝承論』岩田書院 2005。

③ 宮田登『江戸歳時記』吉川弘文館 1981。

风”,未曾被理解为“都市化”。

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要把农村生活向都市生活的改变认定为“都市化”,就必须明确“都市”概念。的确,在以“都市”为研究对象的所谓“都市社会学”“都市地理学”或者“都市人类学”等领域中,基于各种各样的学科体系,相应地“都市”有其各种不同的定义。但是作为存在于与相邻学科不同的学术体系下的独立学科,民俗学既然主张自身的存在,就有必要对“都市”作出其独自的定义。这样的定义尚不够明确。可是如果把“都市”作为“村落”的对立概念考虑的话,民俗学已经积累了很多关于“村落”概念的研究成果。

二、生活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

假设“村落”生活文化是定居在特定地域的人类集团所栽培、养育并在现实中支撑其生活的文化,那么首先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空间概念来把握。它是由与各种自然条件有关,占有一定领域,在其居住地周围的例如支持其生活的耕地、取得生活资料的土地等若干个空间构成的场所^①。不同辈分的人们以集团形式定居、生活于斯。于是跨越若干年代的生活在此累积,然后在这样的集团里被培育并发挥功能的东西就形成为村落的生活文化。

因此,在“村落”中,居住地的自然条件更为强硬地牵制着人们的生活。例如平原、山地或者海岸、岛屿等,即使这些居住地的地理条件不同,以食物为代表的生活材料均是依靠向形成其生活环境的“自然”索取而获得,这个“自然”是不可抗拒的存在,对于由天地变异引起的灾害等“自然”的威力,我们经常会感受到个人的才能和存在是如何的卑微。“自然”既是哺育生命的存在,同时也是威胁生命的存在。

因此作为与“自然”打交道技术的经验知识,必然建立于对“自然”的认识之上,这类认

识的累积就变得重要起来。这也最终保证了人们生活的丰富程度和安全。那么理所当然的是,上述经验知识就具有一边体验各种自然状况及其变化,一边在其中发现什么的特点。因而遭遇这样的机会的多少也决定知识量的多寡。生活在村庄里的人们的人生,是与作为外边的世界的“自然”交流的历史,以年龄为基准形成的社会集团也是传承“自然”与人们的交流知识的场所。在这样的社会中,经验丰富的老者,在出现各种各样的“自然”状态时,也能够准确地拿出对策,所以他们被人尊敬而且被期待着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对于社会安定和丰富性而言,他们曾经是不可缺少的存在。

可是“都市”虽然也是在一定空间里的集团生活的场所,但是它不是依靠“自然”而生存的社会。“都市”是地域的集散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是在进行着导入外来文化、集散物资和发布信息等而经营生活的地方。人们不是亲自向“自然”有所行动而获取生活物资,而是通过与其他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相关行为而得到生活的食粮。比起“自然”而言,他们更优先考虑“人”的存在。因此“都市”不仅与“自然”保持距离,甚至要排除“自然”。所以它是专门以个人的才能、行为优先的社会,因而比起依靠累积经验得来的知识而言,个人独创的、创造性知识才会被认可。它是一个大家相互竞争、发挥出类拔萃能力的社会,而不是经营与他人相同生活的社会^②。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都市”与“村落”是不同的存在,是与近代或现代等时间无关的存在。曾经有观点认为都市化和现代化是同一变化,但是村落中也实施了现代化,可是“村落”并没有成为“都市”,村落里基本在继

① 福田アジオ『日本村落の民俗的構造』弘文堂 1982。

② 柳田國男『都市と農村』朝日新聞社 1929。

续维持与自然的关系,它作为村落在持续存在着。

在被自然制约着生活节奏的村落社会里,由于巨大变化会引起生活的不安定,所以不受欢迎。人们对变化少的平稳生活有所期待。在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事物并由此而维持生活的都市社会里,人们移动频繁,生活变化也很剧烈。不断地追求新事物的社会需要、认可新鲜力量和能力,老人即使得到尊敬,它发挥的功能也不太被需求,这是因为都市不是论资排辈的社会,而是根据能力、效率评价人的社会。

这样,在生活变化剧烈的社会里,生活文化的连续性几乎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变化的样态很显著。对于注重民间传承这一文化连续性的民俗学而言,这样的社会往往被视为其无法插手的世界^①。但是在都市社会里人们也经营家庭生活,人们的生活在无间断地持续着。这就是在以某种形式继承着由上一代传承来的文化。各种各样的人能够运营社会生活,也不是与上一辈的文化存在无缘的。即使是瞬息万变的“都市”生活文化,支撑其生活的文化真的完全不连续吗?

三、生活文化的传达与继承

“都市”不仅是人口密集度高的地方,同时也是功能分化的社会。因为投影于都市空间的支撑其功能的人们的集团、人们的生活和个人意识都是复合性且多层次的^②。这样“都市”生活比起“村落”生活来,在社会性、空间性方面都复杂且呈现膨胀化样态。并且,由于都市生活者的作为大众所具有的匿名性和各种方式的漂泊行为均得到认可,所以其生活的实际状态很难把握。在这一点上,如果要经营安全、丰富的生活,其意义的传达和表现方法比“村落”生活更受重视,其手段也不得多多种多样。但是,不论它如何地纷繁复杂,其生活基本上都是在文化、信息

的传达及其接受、继承的关系下运营。这种传达、继承的关系,如何有效地并正确地发挥功能,将保证都市社会的安定和丰富性。

传达行为自来就是根据上一代生活者自身的价值判断,认定它必定在下一代生活中起作用而让下一代继承的行为。它首先在家族内实行,渐渐地在大小不一的地域、民族集团或国家单位实施。在此,具有共同生活、共有价值观的意愿成为其前提。可是伴随时代变迁,社会、生活在发生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中,人们的需要和认可的东西及价值观等不得不产生变化。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生活差异,使得人们从传承中挑选出想要接受、继承的东西,而且传达者的生活体验、社会背景与继承者不同,因此传达者的意图和继承者的意图有时会有分歧。表面上看即使是同一文化事象,有时候其作用和定位也有所不同。当然伴随着生活的变化,也存在必须添加的东西。

即使在被“自然”强烈制约、变化缓慢的村落社会中,也存在着由这样的传达、继承带来的变化,因此置身于在时间、空间、社会方面更具有多样性的人们所生活的都市社会中,传达者与继承者之间就存在更为多样的差异。并且如上所述,被传达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往往被继承者根据需要而选择、接受和继承。更为特殊的是,生活文化与现实中的运营的生活实际状态有深厚关系,因而对于被认为没有必要的信息,首先就不感兴趣,而仅仅被当作知识而传承的东西也很少。即使是

① 民俗学是什么样的学问这个问题,根据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可是其研究对象以及资料是民间传承,在这一点上大致取得了共识,作为具体的文化事象的民间传承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它是根据传递、继承关系而延续至今的文化事象,所以文化的连续性是它的中心,就是说要从连续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

② 倉石忠彦『民俗都市の人々』吉川弘文館1997。